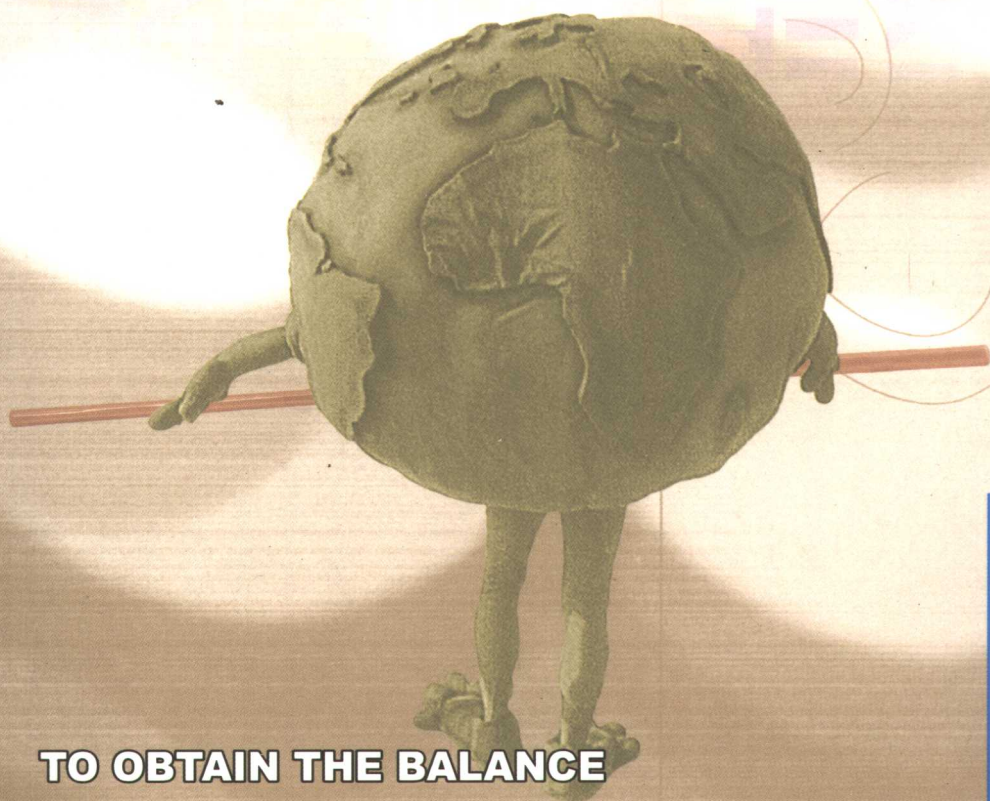


国际问题文丛
INTERNATIONAL
ISSUES

唐永胜 徐弃郁 著

寻求复杂的平衡

国际安全机制与
主权国家的参与



TO OBTAIN THE BALANCE
IN THE COMPLEXITY

寻求复杂的平衡

国际安全机制与主权国家的参与

唐永胜 徐弃郁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求复杂的平衡：国际安全机制与主权国家的参与/唐永胜，徐弃郁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12

(国际问题文丛)

ISBN 7-5012-2468-4

I. 寻… II. ①唐…②徐…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826 号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王 江
金 延
孙宝旗
孙唐平
何 莉

书 名

寻求复杂的平衡
——国际安全机制与主权国家的参与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 × 1230 1/32 11%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 200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逸舟

永胜等同志新近完成的作品《寻求复杂的平衡——国际安全机制与主权国家的参与》即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在此，除了表示贺忱之外，我还想说几句话，作为对此书的某种推荐。

2005年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国际社会在纪念这个重要诞辰的同时，也在思索它的深刻含义。60年前，为了避免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人类生存环境，美俄英等大国牵头，包括中国在内的50多个国家共同创立了联合国——一个在其后的岁月里始终是全球最大也最重要的政治和安全组织。大半个世纪的历程显示，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安全机制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著名的维持和平行动（PKO）便是典型的事例。期望与现实总有差距；反过来，失望中透着希望。对于国际安全和政治的研究人员来讲，分析联合国的成败和国际安全机制的利弊，始终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在我看来，它不仅应当说明国际安全机制自身的复杂构成、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及教训，还要探讨全球安全与国家安全乃至个人安全这样大相径庭的安全需求之间的紧张与协调，甚至需要提示未来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某些新的制度性安排的线索。对于中国而言，更要研究和平发展的过程与国际安全机制的联系，探讨我们国家未来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性及其约束因素。永胜等同志的新书便是构建如此路径的一种尝试。看过书稿之后，我不仅

赞同里面对当代国际安全机制的描述和界定，也十分认同作者在观察其演化趋势时的视角与取向。

应当提及的是，最近几年，永胜一直参加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推进的一个重大研究项目“中国与联合国组织关系研究”。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他主要负责撰写“中国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机制的关系”分课题。身为国防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永胜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敏锐的专业直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虑到国际安全机制的重要性和永胜写作的速度及潜力，在课题成果《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联合国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一书出版之后，我向他提议，以对联合国维和机制的探讨为基础，把研究领域扩展至整个国际安全机制。他说这恰好与他自己几年来的一个研究设想相吻合。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同志的支持下，永胜等同志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我相信，读者从中不难读出作者对当代国际安全机制的严肃思考，看出新一代中国军事分析家开阔的思路和开放的思想。当然，实事求是地讲，鉴于国际安全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这本书没有、也不可能回答所有的现实难题；因此，与其说它提供了有关当代国际安全机制的某种解说，不如讲是提供了不同意见争鸣的一个平台。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永胜们的行列中来，把中国国际安全研究引向新的、更具创造力的阶段。

以上所说，算是一个短序，供读者阅读参考。

2004年12月31日

唐永胜

前言

实际上对国际机制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研究在 80 年代以后则进一步扩展到了安全领域。从那时起，“国际机制”及“国际安全机制”等术语便开始应用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后各国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精力，将国际机制及其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梁启超先生曾有精辟论述：“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其时代之要求者也。”^① 国际安全机制研究的价值，在于对国际安全局势的演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尤其自冷战结束以来，安全概念的内涵与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

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性问题明显增多，使原本就不平静的国际安全局势更趋复杂化。如何加强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充分发挥国际安全机制的作用，成为解决国际矛盾和冲突的重要途径。国际安全机制已显现出很大的潜力，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而没有广泛的国际合作，人类的前景将变得很原始和无聊。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的学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安全机制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进程的加快和程度日益加强，中国逐步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国家。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国家安全和在国际安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日益需要积极加入到有关的国际安全机制中去，在参与中谋求安全，寻求合作，担当责任。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对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一些成果也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同时由于安全机制本身又是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的，因而对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还需要不断深入，更何况相关研究在国内仍然十分欠缺。

毫无疑问，以国家追求自身利益为基本特征的权力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仍占有主导地位，其中许多方面长期以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修昔底德描述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距今已经过去 2500 多年，但是却同 1947 年开始的阿以冲突有许多相似之处。吉尔平曾说过，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国际政治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修昔底德仍可理解今天的世界。^① 国际政治中确实一直存在一种权力逻辑，国家时常会像当时雅典一样处在安全困境之中。但世界毕竟在变化，权力政治日益显示出狭隘的一面，其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二战后，法国和德国关系的发展使这两个国家不仅超越了安全困境，而且成为欧洲联合的主要推动力量。

^① [美]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2 年版，第 340 页。

对于国际机制及其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学术界尤其是国外学者中存在很多争论。但不同学派之间本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对于国际政治的重大发展,谁都难以视而不见,绕过去或简单的否定皆非解决问题之计。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增强及其对整个世界体系产生的作用,一系列过程积累起来已经构成了伟大的事变,其影响具有基础性和渗透性,要认识其内在逻辑需要视接万里,观察演变的全程,而避免受静态方式和固定思维的束缚。局限于某一理论范式或有限的视野,对于寻求复杂问题背后规律性的东西将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无异于缘木求鱼。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

进行国际安全机制领域的研究,也必须充分考虑到背景及由此带来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当然,一项严谨的有意义的研究必须在认真梳理和充分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应该力争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进并有所创造,尤其需要立足于对有关重大问题本身的研究,其中的关键则在于认识其发展演变的逻辑或内在规定性。只有针对问题本身的创造性研究才可能具有鲜活的特征,也才能更好地借鉴和传承先前的发现和智慧。在借鉴和传承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承,对待传统的和经典的理论如此,对待新近出现和引进的理论,包括西方的一些国际关系理论,也应如此。并且,如同其他重大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样,对于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不仅要作“具体的和朴实的”分析,也需要用宏观和概括的视角进行探索。^②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②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曾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这两种途径分离的倾向。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梁启超曾将学术研究的发展演进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①以此衡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可以认为已经处于蜕分期。在这个时期，研究领域的“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承其流者，不过据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②因此，对于林林总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积极引进借鉴过程中，应该取其精要，避免拘泥于细枝末节，更不要盲目追随，以致在不自觉中因袭了原有的缺陷。

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深深认识到国际安全机制在国际安全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力是日趋上升的，也是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已经成为对传统权力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而且，国际安全机制的演变与国际关系中权力结构和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存在一种密切的互动。全书围绕国际安全机制发展轨迹及其演变逻辑展开分析，并注重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的探讨：第一，研究国际安全机制的内在动力与矛盾，探讨国际安全机制的演变轨迹及未来发展趋势；第二，分析主权国家面对国际安全机制所做的不同选择、背后的考虑以及利益得失；第三，理清中国与国际安全机制关系发展的脉络，进而寻求中国在日益复杂的安全网络关系中较为合适的战略和政策的选择空间。总体上说，这是一项应用理论研究，而强化战略性和综合性分析则是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对自我的要求与约束。

不过，主观愿望是一回事，能否做到是另外一回事。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两年多的艰辛探索，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

在这段时间里，充分体会着思考与写作的甘苦。我和弃郁两人经常为某些重要问题反复讨论，一旦理清头绪和线索，那种欣喜和振奋就激励我们更深入地探索；然而，某些问题也常使我们不得不废寝忘食，努力开阔思路，追求豁然开朗那一刻的到来。而现在终于可以将本书奉献给读者，期待着批评和回应。

本书属于社科院“十五”重大课题“中国与国际组织——加入与适应的过程”研究工作的延伸和深入。王逸舟作为课题组织者和设计者，不论对课题研究本身，还是对最后成果的出版，都提供了学术指导和诸多支持。对逸舟的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要对世界知识出版社，对本书策划编辑曾伏华先生和责任编辑王江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由于有了他们的大力帮助和辛勤付出，本书才得以迅速而高质量出版。

唐永胜

2004年8月17日

CONTENTS

目 录

第一部分 国际安全机制：理论分 析与现实轨迹 /1

第一章 基本的理论探讨 /2

- 一、概念与分类 /2
- 二、内在动力、基本条件与国际安全机制
的形成 /10
- 三、内在矛盾的变化与机制的延续和
解体 /31

第二章 国际安全机制的历史考察 /44

- 一、近代国际安全机制的产生——“欧洲
协调” /45
- 二、世界性国际安全机制的出现和
发展 /54
- 三、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国际安全
机制 /70

四、冷战后国际安全机制的新发展 /86

第三章 国际安全机制的现实问题 /100

一、新现实与旧逻辑 /100

二、国际安全机制的作用与国际关系复杂化发展 /109

三、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115

四、欧亚大陆将成为运用和检验安全机制的重要地区 /122

五、简单的归结 /133

第二部分 主权国家参与国际安全机制的战略选择 /137

第四章 收益与成本：参与安全机制的基本权衡 /138

一、参与机制的安全收益与安全成本 /139

二、收益与成本的扩展 /150

三、不参与的代价 /161

四、收益与成本的整体核算：国家利益作为尺度 /165

第五章 主权国家参与国际安全机制的动态权衡 /175

一、在互动过程中调整 /175

二、国内因素的影响 /183

三、外部威胁的变化 /190

四、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变化着的大前提 /196

第六章 多重机制下的参与选择 /209

一、“简单”的“多”：收益—成本分析的迭加 /210

二、“复杂”的“多”：安全结构与国家的定位 /215

三、具体分析之一：对抗性安全结构下的考虑 /222

四、具体分析之二：面对非对抗性安全结构 /232

第七章 安全机制的现实应用 /246

一、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 /246

二、美国与北约势力的扩展及其反向逻辑 /256

三、英国在美欧之间的选择 /264

四、俄罗斯的困难与化解 /275

五、弱势国家的艰难探索 /282

第三部分 中国对国际安全机制的参与 /293

第八章 参与的轨迹及利益分析 /294

一、历史回顾 /294

二、对主要机制的参与 /299

三、参与中的困难 /310

四、参与的动力 /318

第九章 积极探索和拓展参与空间 /326

一、在与世界的联系中确立参与国际安全机制的基本
姿态 /326

二、立足亚太扩大战略回旋空间 /333

三、经营周边建立稳固的战略依托 /343

四、在参与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347

五、参与安全机制与自身进步 /355

第一部分

国际安全机制：理论分析与现实轨迹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建立国际安全机制主要为了走出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在国际体系的层面，则是提高安全领域的有序性和可预见性。因此，从一开始，国际安全机制就是作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对立面存在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国际安全机制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动力。

由此产生两个后果：①国际安全机制的存在依赖于这种无政府状态，没有后者就不需要前者。因此，国际安全机制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是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承认，无论多么完善的机制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状态。这就决定了对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一般都不能离开权力、利益等现实主义模式的分析。②国际安全机制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至少是弱化了这种无政府状态，提高了国家安全行为的理性程度和可预见性。因此，对安全机制的研究必然也要走出狭窄的权力和利益范畴，考虑和导入道义、价值观、信任等因素，使其能更全面地反映和解释现实。这种综合不仅存在于我们的研究过程，更存在于客观现实。而研究从根本上就是要反映并解释这样的现实。

第一章

基本的理论探讨

一、概念与分类

单地说，国际安全机制就是指作用于安全领域的国际机制，是国际机制中的一个类别。这就决定了任何有关国际安全机制的定义或是概念，都必须依赖于对国际机制这一更大概念的界定。努力廓清国际机制的含义，并进而给出国际安全机制的概念，便成为本书研究的起点。

对国际机制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从那时起，“国际机制”这一术语广泛出现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领域。^①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后期的十余年间，各国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精力，

^① 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

将国际机制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国际机制这一概念本身也一再成为研究和讨论的重点。总体上看，各种学派的解释尽管众说纷纭，但国际机制的一些基本要素和特征都已得到概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和补充，将使国际机制的概念更加完善，也可从中推导出国际安全机制更确切、更全面的定义和概念。

1. 概念探讨：从国际机制到国际安全机制

目前得到最广泛认同的关于国际机制的定义是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作出的。他将国际机制界定为“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确的（explicit）或暗含的（implicit）原则（principle）、标准（norm）、规则（rule）与决策程序（procedure），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其中，“原则是对于事实、因果关系和公正的信念；标准是以权利和义务定义的行为准则；规则是明确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决策程序是对作出和执行集体决定的普遍实践。”^①这个定义相对准确，但问题也十分明显。首先，他给出的四个要素（原则、标准、规则、决策程序）之间的区别与相互关系是含糊的，奥兰·扬就认为克拉斯纳的定义只是将几个难以区分的机制要素罗列了出来。^②其次，按克拉斯纳的解释，国际机制也显得过于抽象，人们难以判断什么是“纸面上的”国际机制，什么是具体的、现实存在的国际机制。为弥补这一缺陷，德国学者沃尔夫（Wolf）和泽恩（Zürn）在1986年提出，克拉斯纳的定义中应将行为本身作为一个要素增加进来，以便将机制与国家可能遵守也可能不遵守的保证或约定区分开。因

①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②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ward a New Theory of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39, 1986, PP. 104 - 22.

此，他们在克拉斯纳的机制四要素之外又加入了“有效性准则”，^①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些要素，国际机制的定义才完整，才能更好地反映国际机制的实质。

但是，这样的解释仍不完整，或者说这仅仅是国际机制的定义，而不是它的概念。严格地说，作为概念，它本身就应当蕴含着分类，因为“概念并不是不曾规定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是已被规定的；但分类却是概念的这种规定性发展的表现；分类就是概念的判断，它不是关于任何一个被当作是外在对象的判断，而是概念对本身在下判断，即是说，对本身进行规定。”^②而以上两种界定与国际机制的分类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离开这些定义也完全可以把国际机制分为国际安全机制、国际经济机制、国际环境机制等类别。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他们将国际机制作为一个直接的存在物来定义，没有考虑到国际机制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范畴。考虑到它的历史范畴，国际机制的概念中至少应将建立国际机制的目的作为一个要素包括在内。罗伯特·基奥汉在1989年提出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机制是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受多个政府认可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institution）”。^③虽然他把克拉斯纳等人关于机制的几大要素合并为“明确规则”一词失之过简，把受政府承认作为机制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可商榷，但他把机制作了“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这样一种重要的限制，这个定义就将国际机制的目的性包含在内，即指出了国际机制是针对什么而建立的。包含有目的性的国际机制概念明显要完整得多，这样我们就

① Volker Rittberge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Germany”,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3, P.9.

②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3页。

③ Robert Keoh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1989, P.4.